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七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三九期 ——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11e）

---

【读书笔记】红卫兵小报主编如是说——读周孜仁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	舒 崇
【书刊评论】读徐景贤《十年一梦》有感	胡 平
【叩问历史】与曾思玉将军书（节选）	鲁礼安
【文献资料】文革期间对外国友人的三篇谈话	毛泽东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读书笔记】

红卫兵小报主编如是说  
——读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

• 舒 崇 •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一书值得一读。作者周孜仁，文革期间是鼎鼎大名的四川重庆大学815战斗团的《815战报》主编，他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大局已定，815必胜》曾经被毛泽东点名，被算作全国五大毒草只一。可以想像，由这样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文革风云人物写的文革回忆录，一定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深刻的启示。

文革时，我在四川成都上高三，对四川地区的文革史，包括对重大815派的故事可说是耳熟能详，了若指掌，因此对这本回忆录格外感到亲切。我的老朋友，也是当年成都的老高三，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著名的文革专家徐友渔为这本书写了序。徐友渔指出：作者以其在文革时期的年龄、文化程度、介入程度，以及作用、地位，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重庆文革的有始有终的、较全面准确的，点面结合的画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既有各种事件的描写，又有个人内心情感刻画的故事。这部书写得有激情，有文采，而最宝贵的是它的真实。我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作者的平和心态，他既不想自我标榜，又无意为自己洗刷，这就使得

他的描述比较客观。

作者的谦虚，不，更准确地说是诚实与理性的态度，令人衷心敬佩。举一个例子。周孜仁写的那篇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批评，当时曾有全国五大毒草之说，周孜仁的这篇文章名列其中。作者说，他把自己的文章和其他几篇大毒草作比较，发现别人的文章在文革许多本原性问题上进行大胆质疑，有理论独创和大无畏的勇气，自己的文章只不过“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煽动技巧而已”。我们知道，在以往历次运动中，有很多文章被定为大毒草受到中共领导人点名批判，事后，很多作者都以此作为夸耀的资本，他们还竭力给读者一种印象，似乎是出面批判的领导人的级别越高，被点名的文章和作者的身价也就越高。周孜仁的文章是被毛亲自点名的，按说他更有资本抬高自己那篇文章和自己的身价。可是周孜仁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极其客观地认为自己的文章不行，比不上别人那几篇文章。这种诚实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 群众参加文革图的是什么呢？

重大815是重庆地区的老造反，人多势众，又有重庆驻军的有力支持，在重庆地区占压倒优势。可是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对四川问题发表指示性讲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这一派。对于这次讲话，815派自然心里是不满的，不服气的，但也无可奈何。正象作者写道的那样，文革两大派“对信仰的狂热不亚于宗教徒。问题是，他们的上帝和远在虚空的上帝不一样。天堂里的上帝因为他的虚无而让信徒有可能按自己的观点去任意诠释，从而最终实现自己心灵的平衡；真实存在的上帝则不一样了。他健在，据说身体还非常健康，他随时要亲自发表最高指示。而且指示变化莫测，甚至自相矛盾，让你既不能从容，更不敢拒绝，剩下的，就只能是尴尬和无奈。”这段话讲得很精辟。它涉及到文革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群众（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和领袖（毛泽东）的关系。值得有心人进一步发挥阐述。

在3·15讲话中，江青的表现尤其恶劣。江青的讲话信口开河，既无耻又霸道。江青公然说：“杨尚昆是恶霸地主，他的家属没有好的。”这叫什么话？杨尚昆无非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早年就参加革命，怎么自己就成了地主？而且还是恶霸地主？“他的家属没有好的”。一句话就把杨尚昆的一大堆亲戚都给捎带进去了。周孜仁提到杨尚昆有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是重庆化龙桥某单位普通职工，平时好吹嘘他和杨尚昆的亲戚关系，江青这句话一出，这个倒霉蛋立刻就被揪出来实行群众专政。还有段话更让人恶心。在3·15讲话时，李大章在场。李大章是四川省省长，当年在延安时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这时候正准备结合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江青对李大章说：“李大章同志，我为了接济你，一天吃两个烧饼，你要保持革命晚节。”江青居然把自己几十年前吃两个烧饼的事当理由，要求别人忠于自己。这叫什么逻辑？作者感慨道：“两年多来多如牛毛的各种‘指示’‘讲话’，类似无聊透顶的东西比比皆是——如此下作的人竟然执掌着八亿大国的命脉，泱泱中华，其可哀也，何有甚哉？”作者宣称：“我不再迷信了。”

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两年多来类似无聊透顶的中央首长讲话比比皆是，为什么你不早早地认清庐山真面目，一直要等到两年之后才从迷信中脱身而出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在其他地方有所说明。1967年重庆大武斗，两派都死了不少人。周孜仁写道：当时，“我们曾经那么动摇不定，牢骚满腹，曾经对文革疑虑重重，甚至开始反感，但一听北京为自己说了几句好话，顿时又受宠若惊了。”作者说，悲剧在于，人们总要等到完全绝望，等到被他们崇拜的神狠狠扇一巴掌，这才会清醒过来。这大约就是老话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为你原来在文革这场戏里面好歹是个角色，是个人物，你有戏可唱，有观众观看，你有某种被承认的成就感，因此你就不会去在意剧情的荒诞和自己角色的荒诞，你就会依然津津有味地演下去。等到你被赶下舞台了，没戏可唱了，你才会从另外的角度去审视这场运动，从而产生和先前大不

相同的观点。

文革中，广大群众热烈地投身运动。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对此，周孜仁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政治社会和金钱社会一样，所有活动总有一种终极推动力。后者是物质利益，前者是政治需求。政治需求对于处在社会金字塔尖的极少数人，是权力；而对于最广大的老百姓，仅仅是虚无缥缈的信仰和微不足道的荣誉。”如今中国有个流行病，很多人在思考人的行为动机时，最终必定归结到利益。这多半是早些年历史唯物论的影响，再加上后来的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按照这种流行的思考方式，人的各种行为表现无一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你还没有把一种行为完全地归结到利益，别人就认为你还不够深刻。这真是连古人都不如了。古人尚且知道人的追求除了“利”还有“名”，而且“名”还常常放在“利”之前。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里，发挥黑格尔的观点，把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追求承认。这个“名”字，就和黑格尔所说的“承认”的意思差不多。应该说周孜仁的观点也是和这种观点比较接近的。

◇ 郑思群临死前说过些什么？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这本书讲到了文革期间发生在重庆的大小很多事件。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运动初期作者秘访重大党委书记郑思群夫人吴耕书的一段故事。郑思群是重大党委书记，革命资格很老，深受学生尊重。文革一起来，他就被重庆市委当作“黑帮分子”抛出来隔离审查，随后就自杀身亡。周孜仁怀疑郑是被害死的，于是就采矿系学生蔡增其秘密潜去市委党校走访了郑的夫人、该校副校长吴耕书。

按照作者的回忆：“吴听说重大学生，便称病不见，而我们则坚持不见不走——最后，她妥协了，让秘书把我们领进了她的办公室。吴非常谨慎地把门窗严闭，这才开始同我们对话。我首先出示了郑思群‘十大罪状’的抄写件并自报家门，迫不及待地说明我们的观点及同学们保郑的凛凛决心。年轻人的幼稚和真诚显然把老太太征服了，那天下午，她公然簌簌地向两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说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危险的话。这些话如被告发，她的政治前途将十分可怕。我们当然希望她能证实他的丈夫死于谋杀，因为在工作组公布的材料中曾提到：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前，曾让他们夫妻有过一夜团聚。而8月2日上午，工作组通知吴回校告别丈夫遗体，却被吴明确拒绝。我们以为，老太太对郑的死因一定有足够的判断依据。不料老太太非常肯定地对回答，听工作组通知说郑自杀身亡，她就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杀了。’她说。这个武断的结论使我们大失所望。不用再追问，她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和郑诀别那一夜，他俩都彻夜未眠。郑对她发了很多牢骚。郑说他把政治看透了。郑说彭德怀、黄克诚这样战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我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还说了苏联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和其它一些党史上让人齿寒的、我们这两个刚刚走进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听闻或不曾听闻的故事。末了，她劝我们：你们还年轻，政治斗争复杂得很呢！你们就少过问吧。那些日子，大学生目空一切，头脑发热，以天下事为己任，可面对老太太消极厌世的教导，竟无话可说。我和蔡相约：为了保护老太太，也不至于给学校里对工作组的斗争带来影响，我们把对吴耕书的访问以及她的谈话瞒下来——一瞒就瞒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们自己都已年迈。”

作者对吴耕书的话转述的不够详细，这是很可惜的。不过就从作者转述的几句话来看已足够沉重。广州学者单世联说，老干部在文革期间挨整的时候是怎么看待毛泽东，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由于缺少原始材料不得而知。这里，周孜仁就提供了一份材料。原来，早在1966年8月，郑思群就把毛泽东的这场文革看得很透了。郑思群可是比那些自杀前还留下“毛主席万岁”字条的老干部们高明多了。在文革的整体愚昧与狂热中，该有多少人是带着对文革、对毛的清醒认识而被迫无声地离别人间的啊！因为在当年那样的环境下，他们甚至找不到可以倾吐心声、可以传承记忆的人。

~~~~~  
【书刊评论】

读徐景贤《十年一梦》有感

• 胡 平 •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读了几本关于文革的书，其中一本是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该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全书共433页。

徐景贤算得上文革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原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去了北京，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徐景贤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判处十八年徒刑。1992年保外就医，从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这部回忆录。

◇ 徐景贤造反内幕

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又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却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是不是徐景贤的路线斗争觉悟特别高、革命造反精神特别强呢？不是。徐景贤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带头造反，是因为他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内部消息。

文革一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即被选入中央文革小组而调到北京，徐景贤则是上海市委的文革小组成员，原本是保上海市委的。在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上海市委派出朱永嘉到北京打听政治风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托朱永嘉带话给徐景贤，说上海市委执行了错误路线，要徐景贤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几天后，姚文元又特地给徐景贤打电话，明确地暗示他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于是徐景贤就在大会上揭发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也许有人会问，按说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丕显、曹荻秋都是徐景贤的顶头上司，论职位陈丕显、曹荻秋还比张春桥、姚文元高一些，徐景贤凭什么敢遵循张春桥、姚文元的暗示去反对陈丕显、曹荻秋呢？那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话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央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早在一年前，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叫姚文元悄悄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而姚文元就是躲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办公室写他的文章的。当时徐景贤们就知道这是一条通天的线，从姚文元连到张春桥，再连到江青，连到毛本人。因此徐景贤有恃无恐。由此可见，徐景贤的造反才真正是奉旨造反，因此根本算不上造反。

◇ 徐景贤笔下的王洪文和张春桥

徐景贤和四人帮中的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关系都很密切。看看那他笔下的这三个人是什么样子倒是很有意思的。在徐景贤笔下，王洪文实在是个草包。他当初当上上海工总司的司令就不是靠本事而是靠小权术。本来在工总司的初期，冲锋陷阵带头干作决策的都是潘国平，不是王洪文。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时，王洪文

耍了一个花招。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王洪文讲自己出身雇农，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现在是工人，是党员又是保卫科干事，再加上是老造反。而潘国平刚二十出头，只是个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就让王洪文比下去了。按照徐景贤的描写，王洪文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一朝飞黄腾达，只想着吃喝玩乐。毛泽东怕他不争气，特地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结果王洪文比刘盆子还不如。就在毛泽东病危，中央决定让华国锋和王洪文轮流守候，王洪文居然还有闲心在中南海打猎，真是不堪造就。在古代，也有出身低下的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被皇帝提拔到显赫的高位，这种人不论是忠是奸，一般总还会表现出勤勉和好学的样子；像王洪文这么差劲的真还不多。

看来徐景贤对张春桥、姚文元都颇有好感。在他的笔下，姚文元很朴素，平易近人，但不像是有什么大本事，遇事总说“和春桥商量”。张春桥比较厉害，比较精明，但有时也很迟钝。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当过叛徒，虽然由于张春桥的缘故而在文革中免遭于难，但总是给张春桥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丝阴影，所以尽管夫妻感情很好，到后来张春桥还是决定和文静离婚，并托徐景贤帮他找合适的对象。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在毛泽东去世，办完丧事以后，华国锋们磨刀霍霍，四人帮大祸临头，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竟浑然不晓，就在10月1日——这离四人帮被抓只有五天了，张春桥还给徐景贤写信，叫徐把物色的对象的材料“送来一阅”呢。我疑心作者写下这段故事也有替张春桥鸣冤叫屈的意思：你看，人家张春桥哪里是阴谋篡党夺权呀！？

不过，我们要是把张春桥看成不谙权术的书生，那就错了。徐景贤讲到一件事足以为证。1966年年底，上海工人赤卫队（保守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了，大队人马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刷出“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比造反派提出的“炮轰”、“火烧”还激进。在北京的张春桥知道情况后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文静，转告徐景贤不要让保守组织夺走胜利果实。徐景贤赶快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把原先的口号升级，从“炮轰”、“火烧”改成“打倒”。工总司干脆调集大批人马冲进市委大院，大打出手，把赤卫队打得落花流水，举手投降，首开全国群众大规模武斗之先例。武斗刚结束，张春桥就从北京打电话询问，斩钉截铁地对徐景贤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真是十足的流氓。

按照书里的描写，徐景贤对周恩来相当尊重，彼此的关系很好。这就怪了，因为我们知道，至迟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和周恩来的矛盾就很深，所谓批林批孔其实是批周。看来，对于四人帮和周的关系，作者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另外，据说徐景贤和原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斗得很厉害，最后郭自杀身亡。对此事作者却只字未提。再有，作者对70年庐山会议着墨甚多，但是对林彪一派和四人帮以致和毛的矛盾的来龙去脉讲得很少。很难让读者获得一完整印象。

#### ◇ 缺少反思令人失望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者语焉不详，让人看不明白。比如说四人帮被抓后，徐景贤们在上海开会部署准备武装反抗，可是中央来了一个通知就老老实实去了北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徐景贤们难道不知道去北京是自投罗网吗？为什么连叫都没叫一声就举手投降了呢？可见原先就没什么底气，原先就心虚得很。张春桥在1976年5月16日给徐景贤的那封托徐找对象的私信里写道：“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张春桥都不时地想到被“杀头”，可见多么心虚。张春桥把这话写在信里，说明他和徐景贤私下交谈时一定不止一次谈过这些问题和感觉。那么徐景贤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呢？在最应该写出自己思想活动的地方，作者却没有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不能不是本书最大的缺憾。作者把自己文革十年的经历比作一场梦，那么在执笔写作此书时当然是梦醒了，以作者的才气、知识和阅历，读者有理由满怀期待，想看看作者有多少反思与醒悟。可是在这一点上，作者令读者大失所望。

有读者批评徐景贤回避重大问题，例如林昭的问题。林昭是在文革期间的上海被当局下令枪决的，那时徐景贤正是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他这本书对此却只字未提。不过在我看来，徐景贤没写到林昭的事倒未必是有意回避，很可能是本来就没放在心上。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对于当时的徐景贤们而言，枪毙像林昭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是文革中许多大人物的传记、回忆录或采访录的一个共同盲点。同样地，文革之所以被很多人误解为仅仅是精英的浩劫，以为在文革中底层民众并没遭什么罪，那也是因为在这类文字中，底层民众的遭遇很少被提到，而不被提到的缘故就是因为作者在心目中，底层民众（特别是所谓黑五类）的那些遭遇太司空见惯，也太习以为常了。

~~~~~

## 【叩问历史】

与曾思玉将军书（节选）

• 鲁礼安 •

……就像你现在嗜好书法绘画一样，信口开河，说假话、不负责的话、没有根据的话，也曾经是你的一大嗜好——我绝不是随便这样说的，因为近40年前，我，还有一大批人，正是因了你的假话、不负责任的话、没有根据的话，而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你既然“思维敏捷”，连70年前的长征往事都“记忆犹新”，那么对于40年前你主政湖北时的往事，就更应该“记忆犹新”，无所遗漏了。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华中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吗？你还记得你是怎样亲自下令将他投入单人牢房，将他推进那长达11年另7个月的绝境之中的吗？你在沉湎于丹青之余，还有兴趣和我一起回顾一遍你当年是怎样制造那桩惊天冤案的吗？好吧，“芝麻，开门！”，让我们一道来唤开那扇沉重的历史之门吧！

事情是从“北斗星学会”开始的。1967年的秋天，我和我的几位同学，打算脱离派性斗争，坐下来研读马列，对文革进行一番理论的梳理和思考。我在《北斗星学会宣言》中，阐述了我们的上述意图。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你在看到这篇宣言时，勃然大怒，竟指责说《宣言》及其反动，反动透顶，“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由于你当时身任武汉地区的党政军一把手，可谓“一言九鼎”，你的这番无厘头的话，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带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们的宣言哪一点反动了？而且是“反动透顶”、“每一个字都反动”。在汉语语系中，怎么可能出现“一个字”的反动呢？我至今仍然莫名其妙！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字”也可以“反动”的话，我大概只能引清朝雍正年间的一个著名的“文字狱”为例了。当时一位江西乡试的主考官名叫查嗣庭的，因为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影射“雍正去头”，竟至丢了脑袋。这个“维”和“止”，就正是“一个字”而够称“反动”的典范。可是我起草的《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找不到这样的字眼呀！宣言中既没有出现“日”字来影射“曾”去了头，也没有出现“王”字来影射“玉”净过身。找来找去，就是在“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句话里出现了个“心”字，有影射将“思”去头之嫌。可那是一句到处都在传唱的”红军歌曲“，我怎么会想到当中有一个字会犯了将军阁下的忌呢？如果你说并非如此，那么虽然过去40年了，我还是要请求你给我一个说法——我那篇不到千字的《宣言》，究竟哪个字，或哪句话，或哪段文字称得上“反动”或“反动透顶”呢？

1979年我出狱之前中共湖北省委下发的“鄂文（1979）70号文件”说：“经再次审查认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还看不出有反动的内容。”那么究竟是该相信你说的，还是相信湖北省委的“复查”结论呢？所以我请你一定要对你当年的说法有一个解释，否则我只能认为，你当年对那篇宣言的定性，是极其轻率、极其不负责任的，是拿我们这些

年轻学生的政治生命当儿戏。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虽然背上“反动透顶”的罪名厄运难逃，但也许还不至于有牢狱之灾，更严重的罪名还在后头呢。1968年3月，你听信当时“新华工”头头张立国、郭保安的一面之词，说我在被学校“隔离反省”时，画了一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动漫画”（一说是“反动标语”）。这个“反图”或“反标”据说涉及到一个字，那罪名就非常可怕了，放在那个年头一旦坐实的话是可以“立即执行，杀无赦”的。可问题是我本人都不知道我究竟画了一张什么，闹得从上到下的“老权贵”“新权贵”们全都欢喜若狂，如获至宝。我只相信一点，尽管我早已经不信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了，但对毛主席仍然是热爱和崇拜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画什么“反图”写什么“反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所以尽管风生水起，我一直泰然处之。

后来，也就是1968年5月，我在铁山遭到绑架。针对这个非法绑架，武汉方面的造反派群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形势十分险恶。当时中央早已三令五申，严禁群众组织私设公堂。你作为武汉地区的最高军政领导，理应按照中央精神下令铁山放人。但是你却只是阻拦群众对我进行营救，而任凭铁山将我非法关押了整整两个月。你究竟为什么竟然无视中央的申令，纵容群众组织的绑架行动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你是要假“铁山联防”这个武斗团体之手，用私刑拷打的手段敲开我的嘴，坐实那张所谓的“反图”“反标”，以将我定为犯有“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但是我在铁山的矿井下识破了你们的用心，无论怎样严刑拷打，坚持证据见面（而铁山和“新华工”生怕我会回忆出事情的真相，只是严刑逼供，就是不让“证据”与我见面），使得你们的意图终于未能得逞。

然而，在“反图”“反标”未能坐实的情况下，我还是被秘密解送进了监狱。在随后的审讯中，“证据”总算与我见了面。通过仔细的辨认和艰苦的回忆，我终于澄清了所谓“反图”、“反标”的真相，以无可辩驳的理由，推翻了这个能将我置于死地的可怕罪名。这一切，“专案人员”不会不向你汇报吧？

但是，由于我已经身陷牢狱，被剥夺了一切的话语权，你居然不顾问题已经得到澄清这一事实，向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在中央首长面前，继续散布作为逮捕我的“根据”的这一严重罪名。如果说在“证据”未有澄清之前，你指我犯有“恶毒攻击罪”还情有可原的话，在“证据”已经澄清之后，你仍然坚持我画了“反画”、写了“反标”，我就无法理解了。你这不是在蓄意陷害我吗？1969年10月3日，当你和你的同伙“刘丰同志”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煞有介事地宣布，“一号头头鲁礼安”是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时，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心虚理亏吗？你一个堂堂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怎么能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对付我一个20岁刚刚出头的学生？！

正如今年第一期《中国焦点》杂志评论部的一篇文章“有错就改与知错不改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中的一句话所说：“错误虽人人难免，但区分良莠、忠奸、贤恶的重要标志却在于其对待错误的态度。”

你当年明明知道在定我“恶攻”的问题是搞错了，却一意孤行，死死地抓住那个并不存在的“反图”、“反标”不放，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虽然快40年了，我的宝贵的青春年华，也早已经被毁灭在那间黑暗的单人牢房里，永远也索不回了，我还是要问你一声：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也许你认为像我这样蝼蚁一样卑贱的学生娃娃，可以任你这样位高权重者随意拿捏践踏。那下面几位并不卑微，甚至可以说德高望重的老人呢？——我指的是王盛荣、周岳森和

干毅，他们都是被你指为“暗中操纵控制我的”北决扬的“黑后台”。干毅且不说了，这位被你指为“国民党反动将领”的国民党起义将军，在你这位“共和国开国将军”面前自然是毫无地位，可以任你肆意糟塌；就是周岳森，不也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中学校长吗，随便加他个“老国民党特务”又有何难？反正都是由你说了算。那么王盛荣呢？若论起革命资格，他可是比你还老。你参加红军时，王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军委委员。长征路上，他和你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一颗树下遮雨、一口锅里吃饭，是你的生死战友啊。你怎么竟然在那次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然骂他“是个小丑”，挖苦他“一条腿，到处乱窜”。这倒也罢了，你还伙同刘丰，诬指他“暗中操纵、控制北决扬”，并以此罪名将你长征中同生共死的战友投进监狱。你这样做真的有什么根据吗？你心里非常明白，其实什么根据也没有。之所以做这种昧良心的事，无非是因为要将“北决扬”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又苦于找不到这些学生的“后台”，于是只好指鹿为马，拿资格虽老，但无权无势的老同志开刀。这就是你虔诚信奉并身体力行的“党内斗争”吗？真的太可怕了！

如果说在“党内斗争”的祭台上，必须拿这些失势的老干部开刀的话，那么将“北决扬”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后，你怎么还不满足，还要在清查“北决扬”“五一六”的幌子下，将数十万无辜群众打成“北决扬分子”而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呢？你是不是觉得“一家哭”、“几家哭”还不够，非得“一路哭”、“满地哭”才能让你心满意足呢？由你一手制造的“北决扬”大冤案，制造了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这就是你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国家、对人民所做的贡献吗？

你从江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走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戎马倥偬几十年，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难道党和军队培养你，就是要你大权在握时，肆无忌惮地大兴冤狱，将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打进痛苦的深渊吗？

仅仅拿你和刘丰当年点名批捕的13名“北决扬骨干”和“后台”来说，就有4人在狱中被关疯（其中2人至今未能治愈），有3人（不包括王老）因身心受到摧残出狱后英年早逝。还有几位获释后一直贫病缠身，穷愁潦倒。至于这13人之外，成千上万遭受迫害的无辜群众所受的苦难，真个是“新鬼烦冤旧鬼哭”，更是让上天也要为之动颜。

1979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批复》中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并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历史终于还了我们一个清白。面对历史的终审裁判，你作为冤案的始作俑者，是否感到过羞愧？

今年九月，就你舒适地坐在疗养院里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神采飞扬地大谈自己长征中的“传奇经历”“英雄事迹”时，王盛荣老人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对于这位因你的诬告而有10年牢狱之灾的长征时期的老战友，你曾经有过丝毫的内疚吗？对于那几十万惨遭过你的迫害，有的至今还在痛苦冤屈中挣扎的无辜老百姓，你心生过哪怕稍微一点点的不安和惶愧吗？如果还有，证明你良心未泯，我仍然敬重你；如果没有，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只想将《新约》上的一句话送给你：天国近了，你悔改吧！

我知道将军你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不会相信上帝的“天国”。

但是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是相信马克思的。你们不是有一句口头禅：“死了去见马克思”，



以能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为无上的荣耀吗？

只是，一个有负于人民、有负于战友而又从未对自己的罪孽有所忏悔的人，即使头上罩了一圈“无产阶级忠诚战士”的光环，马克思会接受他的报到吗？他能够进入马克思的“天国”吗？

如果既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又不能进入马克思的天国，这样一个未经救赎的罪恶灵魂，将在何处孤独地游荡？

致以崇高的敬意！

~~~~~

# 【文献资料】

## 文革期间对外国友人的三篇谈话

• 毛泽东 •

◇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 July 和八月 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2〕。

斯：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3〕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可讨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4），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5），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总要有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6）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7）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8）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9）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10）路线被批判了。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11）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12），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13）。尼克松当过副总统（14），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

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15）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

个兵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噏！噏！噏！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16）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17）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你想到了。

毛：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18）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19）不好，勃兰特（20）也不算怎么好。

斯：我记得你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21）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22）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23）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课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 Belden（贝尔登（24））。

斯：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那个拉提摩尔（25）怎么样了？

斯：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26）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27）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28）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一一《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29）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30）。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31）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32）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33）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34）那张大字报吗？

毛：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35）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 law（法律），是喜欢那个 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36），不行；树立瞿秋白（37），不行；树立李立三（38），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够了。

毛：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够了。

毛：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那是。

毛：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要。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39）到北京，我见了。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40）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就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41）

毛：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

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部分内容已节编入《毛泽东外交文选》。

注释：

〔1〕这是毛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会见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曾送毛审阅，毛批示：“照发。”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谈话纪要，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本篇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编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删节。

〔2〕“五·一六”，见本册第45页注〔1〕。

〔3〕指斯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

〔4〕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5〕摩根，今译摩尔根，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他在《古代社会》中第一次论述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马克思对该书作过详细摘录和批语。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其大量资料，阐述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赞誉他“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6〕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就中美关系问题同中方举行谈判，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7〕麦克阿瑟，一九五〇年六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并极力主张进攻中国。一九五一年四月被解除一切军职，仅保留五星上将军衔。

〔8〕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 9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于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 1 0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严重的损失。

〔 1 1 〕艾奇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国务卿，和杜鲁门一起制订了不承认中国和援助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

〔 1 2 〕指艾森豪威尔，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 1 3 〕肯尼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遇刺身亡。

〔 1 4 〕尼克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连任两届美国副总统。

〔 1 5 〕华盛顿，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被推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一七八三年迫使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一七八九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 1 6 〕毛这句话中所说的年份有不准确的地方。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同年五月，北美十三个州参加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对英国进行武装革命的“宣言”，把北美民兵整编为大陆军，六月即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 1 7 〕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 1 8 〕西哈努克，一九六〇年当选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一九七〇年朗诺发动政变后，西哈努克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 1 9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 2 0 〕勃兰特，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德国政府总理。

〔 2 1 〕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 2 2 〕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只有五十多人。

〔 2 3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4〕贝尔登，美国进步记者。一九三三年以海员的身分来到中国，九年后回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北解放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革命。

〔25〕拉提摩尔，又译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一九四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被派驻中国。一九四二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后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遭参议员麦卡锡弹劾。一九六三年赴英国，任利兹大学汉文教授。

〔26〕麦卡锡，一九四六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并利用其他机构，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

〔27〕《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一九六〇年底完成，一九六一年初开始上演。

〔28〕指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后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北京各大报纸开始都没有转载。《人民日报》十一月三十日才予以转载，并加了经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的操纵下，将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很快发展为政治批判运动。这场政治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吴晗等人平反。

〔29〕刘少奇，见本册第28页注〔15〕。

〔30〕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两国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两国将在三月一日互派大使。

〔31〕指毛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印发了这个文件。

〔32〕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文化大革命”期间，该书和它的作者一起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攻击。一九八〇年三月，人民出版社重印一九六二年修订本，一九八一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卷。

〔33〕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

〔34〕见本书第十二册第90页。

〔35〕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6〕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37〕瞿秋白，参见本册第27页注〔13〕。

〔38〕李立三，参见本册第27页注〔13〕。

〔39〕柯西金，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0〕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41〕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 ※ ※ ※ ※ ※ ※ ※

◇ 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8日）

按：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的谈话。

问：“谢胡同志什么时候来中国的？”答：“去年五月。”

当时我就说，究竟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那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有利，可以不轻视敌人。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作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已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从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前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北京市委时，我们增加了x个卫戍师，现在还是x个卫戍师。以前X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现在红卫兵帮助我

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打人，杀人，杀死了三口人，杀伤三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女，如贺龙、陆定一的儿女。所以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解决了罗，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了，八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在杭州，一天中午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我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样大字报就满天飞了。清华、北大两附中写了两件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八一八接见了八十万红卫兵，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就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发了刘、邓问题。现在双方决战还未解决。今年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解决问题可能到明年三、四月份，也可能更长一些时间。

好几年前，我就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子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分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是赞成的，合作化他就不赞成了。这一批其中有的是所谓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人，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后进党的，其中一部分当了干部，有的当了支部书记，县委书记。第三部分是收留下的国民党，这些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以后叛变了，登报反共（指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叛徒案——注）。那时不知道，现在查出来了，他们不拥护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第四部分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如地、富、反、坏顶多百分之五约三千五百万人。他们是分散的，分散到各乡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敌了。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也是分散的。所以大字报、群众运动、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就吓得要死。

大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修正主义分子了，搞修正主义了。文科不能写文章，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经济学的，可多呢！现在看来有希望，斗得很厉害。（卡博、巴卢库说：斗得厉害好，清醒一下好。）群众都发动起来，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卡博同志说：见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到明年这个时候，可以这样说了。但是也许我们被敌人打败，打败就打败嘛，总是有人革命的。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卡博同志讲：不搞斗争是不成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巴卢库同志说：就是要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就是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象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不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同他们讲过话呢！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成了反革命。夏季是少数，冬季由少数变成多数。井冈山，聂元梓受过压迫，很革命。去年十二月份的，今年一月份分化了。但不管怎么样，总是好人多。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

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了，不行了的。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省上有打倒 xxx 的大字报，打倒 Xxx 的就更多了。杨成武是代总长，管好几个部，xx 部要打倒他。打倒肖华是福建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但有条永远的真理：那就是绝大多数党员、团员和人民是好的。

※ ※ ※ ※ ※ ※ ※ ※

◇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节选（1967.05.01）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是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许多例子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彼此打得好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既然叫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大家不是主张灭资兴无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以自己的话说出来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一个培养问题，不应在他们犯有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应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